

快速量增与艰难质变： 中国当代中产阶层成长困境^{*}

严翊君

内容提要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产阶层赢得了发育成长的土壤和气候。一方面，随着社会转型步步深入，中国当代中产阶层正在迅速崛起、快速量增；另一方面，由于转型中各种复杂局面的出现，中产阶层面临着质的飞跃的困境。而造成困境的原因主要包括：其一，发展阶段的限制；其二，制度体制的分割；其三，强势阶层的挤压；其四，成长周期的困厄。中国努力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进程中，追求中产阶层由量增向质变发展已是势在必行。

关键词 中产阶层 快速量增 艰难质变

中产阶层的快速量增

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多年，可称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早期，这一时期孕育了中产阶层发育成长的土壤，使其破土而生。社会转型早期出现的中产阶层是建国后销声匿迹的中产阶层的“重生”。但是，事实上，这一阶段出现的中产阶层并不是建国前后中产阶层的“复活”，与其也基本没有血缘联系。转型早期中产阶层的出现遵循这样的发生逻辑：1978年开始的所有制改革，使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在消亡了近30年后再度复苏。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1979年2月国务院批转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1982年个体经济首次进入宪法，1988年私营经济的提法首次出现在宪法中……国家政策的一系列变动直接促进了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与此同时，大批返城知青、城市闲散人员（包括一些劳动

教养解教人员、刑满释放人员等未能在国有、集体企业谋到职位的人员）以及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和乡村农民纷纷加入个体、私营、乡镇经济的潮流。其后，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启迪人们对财富展开重新认识。另外，在体制转换的起始阶段，由于税收、行业管理制度上的漏洞，使得最早实现资源与市场相结合的人从税收和其他政策中“享受”了不少好处，迅速实现了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衍生为富裕阶层。同时，“权钱交易”开始抬头并蔓延。这些催生了转型早期的中产阶层。这一时期中产阶层的具体构成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拥有一定权力的机关干部、部分国有（集体）企业领导、某些特殊行业的职员及各类经纪人、明星；靠非正当生意起家的“暴发户”。据陆学艺领衔的课题组的研究，在1978年改革开放发轫时，中国中产阶层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社会态度研究”（项目号：04BSH013）的阶段性成果。

的比重只占全国阶层结构中的5%；到1991年，约为9.5%。^①

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迅速崛起是在社会转型中期。1992年中国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之后，开始从早期工业化步入中期工业化；至20世纪末21世纪开端，东部发达地区和一些大城市、特大城市开始向工业化后期发展。据历史经验显示，当经济结构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后期阶段时，是中产阶级崛起和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2年的研究显示，一个类似于西方现代化社会中的中间阶层已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中现出雏形，但边界尚不很清晰。^②其包括以下基本构成：新生的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小业主、小商贩；党政干部、事业单位管理者与技术人员、国企领导人；“外企白领”；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高新技术行业和其他新行业的高收入群体，如留学回国的创业者、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该课题组1999年在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72个市、县、区的6000份抽样调查显示，当时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已达8000万人以上。^③而周晓虹的实证研究进一步佐证了中产阶级快速崛起这一基本事实。周晓虹带领他的博士研究生从2002年开始，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五大城市的3038户家庭进行了电话调查，根据经济条件、职业分类、教育层次以及自我认同等主要指标的综合考察，得出中国五大城市中产阶层的有效百分比为11.9%。^④

从2003年始，中国进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时期，此后中国步入社会转型纵深期。这一时期，中产阶级量增开始加速。这一方面是因为连续多年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和社会成员的收入都有了明显提高，奠定了中产阶级快速量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为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政策层面明确提出“提低、扩中、调高”的思路，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也为中产阶级的快速量增提供了政策保证。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进入社会转型纵深期的近10年里，中产阶级的量增加快了。陆学

艺领衔的课题组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05年和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展开的综合分析显示，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比例为23%左右。据该课题组估计，中产阶级规模正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扩大，在大城市当中，这个比例还要高。比如，北京、上海的中产阶级已经达到40%以上，“中国中产阶级在加快崛起”^⑤。李培林、张翼基于2006CGSS所获得的数据，以收入、职业和教育作为三个基本维度，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中产阶级规模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在宽泛的定义上，我国目前的中产阶级在全国占25.4%。^⑥这显然比社会转型中期阶段中产阶级的数据高得多。

中产阶层的艰难质变

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虽然赢得了快速量增，但是质性变化的过程却是缓慢而艰难的。必须说明的是，这里的量增和质变有着特殊的含义。

何谓中产阶级的量增？无论是统计数据，还是学者们的实证研究，用于中产阶级划分的标准均比较宽泛，比如，判断是否是中产阶级的成员，有职业、收入、消费、教育、自我认同等标准，无论是统计部门还是学者的实证调查，常常将只达到其中一项或两项标准的人口都算作中产阶级成员。据此，有学者还分别对收入中产、职业中产、消费中产、教育中产等进行了划分和研究。我们说的中产阶级的量增，主要是指在这种宽泛测算前提下中产阶级的数量的扩大。

何谓中产阶级的质变？它是指中产阶级在宽泛意义上的量增基础上，符合综合标准的中产阶级成员占多数。关于中产阶级的综合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给出了6项标准：职业的工作、劳动方式，职业权力，收入及财富水平，就业能力，消费及生活方式，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⑦这里既有客观标准，也有主观标准。

首先，从客观综合标准来看，为了考量的简便性和合理性，多数学者赞成用收入、职业和教育三维客观标准来研判中产阶级。李培林、张翼提出了收入、职业和教育三个维度的中产阶级综合客

观标准: 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14001 ~ 35000 元之间为“收入中产”(2005 年前水平——作者注); 各种领取薪金的、具有一定管理权限或技术水平的非体力劳动者为“职业中产”(不包括体力劳动管理者), 其中也包括自雇和雇主; 取得了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及以上教育文凭的人员为“教育中产”。他们提出, 达到一个维度标准的是边缘中产, 达到两个维度标准的是半核心中产, 三个维度标准全达到的是核心中产。^⑧ 依据这一分析框架, 我们这里所说的中产阶层的质的变化, 就是在中产阶层人口中, 核心中产要占大多数。

其次是主观综合标准, 主要包括自我身份认同(阶层意识)、公民意识和其他道德素养。这里最重要的是自我身份认同。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 才能自觉地培养公民意识和中产阶层应有的道德素养。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分析无产阶级革命自觉性时指出: 只有具有自觉的阶级意识, 才能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 才能清晰地知道本阶级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使命。^⑨ 安东尼·吉登斯也认为, 阶级认同并不表明阶级成员有能动的自我群体的认同以及有排他的倾向, 它是阶级成员间因共同生活背景而自然产生出相似性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而阶级意识则是有明确的共同体的心理边界, 是必须区分“我们”和“他们”的。^⑩ 也就是说, 中产阶层成员只有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 他才能确立现代中产阶层应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使命感, 他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产阶层成员。

如果按照综合的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衡量, 中国中产阶层在迅速量变的过程中, 其质变显得异常艰难。从职业和收入看, 早期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中产阶层, 已经具有现代中产阶层的特征。但是, 由于历史的原因, 他们中的多数人文化水平不高, 只有少数人具有大中专以上学历, 一部分人具有高中学历, 多数人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 甚至还有文盲。而中期社会转型和纵深时期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层, 符合客观综合标准的人也还是不多, 根据李培林、张翼的研究, “如果用职业、收入和教育三项指标界定的中产阶层, 即比较宽泛地定义的中产阶层占社会成员的 25.8% (老中产阶

级即私营企业主和个体企业经营者数量抬升了该数字)。其中三个维度都符合‘中层’标准的‘核心中产阶层’只占 3.2%, 符合其中两项‘中层’标准的‘半核心中产’占 8.9%, 仅仅符合一项‘中层’标准的‘边缘中产阶层’占 13.7%。所以, 如果将符合其中两项标准者认定为‘中产’, 则中国当前的中产阶层大约占 12.1% 左右”^⑪。如果只有核心中产才能算是真正的中产, 那么, 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只占总人口的 3.2%。

更值得注意的是, 有的人虽然符合中产阶层的综合客观标准, 但他却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李培林、张翼的研究说明, 在“核心中产阶层”中, 只有 61.7% 的人认为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属于社会“中层”。而本课题组在 2011 年 1 月抽样调查的 472 份有效样本反映, 符合客观综合标准的中产阶层成员认同自己经济社会地位属于中产阶层的不到 60%。正因为此, 一个问题出现了: 当代中国有中产阶层吗? 有学者认为, 处在传统农业社会快速解体和重新定位过程中的中国, 阶层的迅速分化和快速重组尚未完全实现, 不敢轻言中产阶层, 最多也只能是有中产者而无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⑫ “所谓的中国中产阶层部分是由传媒与学者制造出来的神话和泡沫。”^⑬ 诚然, 此种说法有些过头。但是,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由于社会公平不尽如人意, 职业中产、收入中产、教育中产的重叠概率还比较小, 符合综合标准的中产阶层的阶层意识更是有待提高。

中产阶层成长障碍分析

事实上, 在现阶段, 由于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使中国中产阶层的质变异常艰难。如果边缘中产不能实现质变成为半核心中产和核心中产, 则可能向下流动至社会结构下层; 如果不确定因素过大, 甚至半核心中产和核心中产也可能出现向下流动。这些不确定因素主要包括:

1. 发展阶段的局限

根据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当代解释, 在 21 世纪前后,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之后, 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所谓关键时期, 一是发展进入增长速度加快的黄金期, 二是发展进

入矛盾的凸显期。这一时期,随着人均 GDP 的上升,贫富差距拉大,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公平缺失。这是库兹涅茨曲线所说矛盾凸显期的主要方面,这一时期也称为“二难时期”。库兹涅茨曲线有一个拐点,通过拐点,则进入发展的“双赢时期”,人均 GDP 提升,贫富差距缩小,医疗、教育、劳动就业等逐步趋于公平。通过拐点的条件是和谐发展、科学发展。中国在 2003 年人均 GDP 超过 1000 美元,2010 年达到 4000 美元,处于典型的“二难时期”。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很快,人均 GDP 快速提高。但是,平均数不能代表大多数,首先,贫富差距明显拉大。这一时期,在中国城镇人口中,10% 的高收入者与 10% 的低收入者收入之比一直在 10:1 的位置上徘徊;从城乡差距来看,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纯收入之比达到 3.23:1,而根据联合国的测算,世界平均城乡居民收入比只有 1.5:1。同时,医疗方面,在中国,不同人群医疗保障水平大不相同,在享有公费医疗的人群中,有的人“无病呻吟”,浪费极大;有的人只享有极低的医疗保障,“因病返贫”者不在少数。教育方面,“有偿择校”增加了教育的不公平。教育不公平带来的是人的可行能力^④的差别和机会差别,使较多的人因可行能力不适应发展需要而拥挤在低技能的职业中,而无法获得一些高要求的职场机会。教育导致的职业差别和机会差别,又直接影响人们的收入,并最终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从而形成了教育差异—机会差异—利益差异—社会地位差异的链式演进。这种链式演进,可能使一部分边缘中产向下流动,而核心中产与半核心中产也可能在这种链式演进中失去某些方面的条件而向下流动为边缘中产。这样,向核心中产的聚集就面临较多挑战,从而,形成了中产阶层质变的艰难历程。

2. 制度体制的分割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这符合中国的国情特点,但也因此带来了二元制度体制的长期并存,这种二元的制度体制扼制了中产阶层的成长。首先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二元制度方式不利于一部分中产阶层人士的质的提升。所谓体制内,就是在一些部门、行

业,比如政府部门、准政府部门^⑤、垄断行业,计划经济、公共权力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及教育有明显的支配作用,进入这些部门和行业,即进入体制内。政府和准政府部门享受财政兜底的收入分配方式,同时又以公权力“寻租”获利,用公费获得继续教育、考察等好处;垄断行业则可以通过垄断的形式,独享某些紧俏、稀缺资源而带来发展优势,从而使其员工获得高于其他行业数倍甚至十多倍的收入,享有丰厚的津贴、教育、娱乐和其他各种保障。因此,在这些部门和行业,中产阶层的质量提升是比较快的。

但是,中国更多的人群是处在体制外的。所谓体制外,是指不能享受计划经济配置资源、完全走向市场的那部分人群,比如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农民工等。体制外的人群发展的际遇也不完全一样。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的发展烦恼,是他们基本没有可能进入体制内操控公权,因此,基本没有可能获得被计划方式和垄断方式掌握的紧俏资源、稀缺资源,他们要想获得这部分资源将付出巨大代价。同时,也无法获得政府财政对他们的眷顾,因此他们更注重的是财富的积累和相关的物的方面的发展,至于教育和精神文化方面的发展,则无暇顾及,这常常阻碍了他们向“核心中产”的质变。而农民工则是制度外最典型的人群。照理说,农民中的流动人口(进城务工农民,常称“农民工”)是最有可能进入中产阶层队伍的。但事实上并非那么容易。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作用,农民进入城市,无论是在体制内的行业还是体制外的行业工作,都只能是体制外人员,这使他们始终处在自身发展的“二难境遇”中,即农民工既是现代化的开拓者,又是可行能力相对匮乏者;农民工既适应了社会需要,又遭遇到社会排斥;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自身却处于相对贫困当中。农民工要改变个体境遇,上升流动到中产阶层,尤其是成为“核心中产”是极其困难的,更遑论改变农民整体处在社会结构底层

3. 强势阶层的挤压

处在发育成长期的中产阶层,受到了强势阶层的挤压,正是这种挤压,使中产阶层在量增过程

中的质变显得异常艰难。这里所说的强势阶层,是指利用已有权力、财富和地位优势,过多地、不合理地获取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和各种发展机遇的社会群体。强势阶层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的既得利益,必然对中低阶层进行挤压。而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无疑对强势阶层的特殊利益获取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障碍。于是强势阶层从先前主要对在阶层结构中占大多数人口的边缘阶层的剥夺转向更多地对中产阶层的挤压。这种挤压,不仅使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到上层和中上层变得十分困难,也使边缘中产上升为半核心中产和核心中产变得困难。

强势阶层对中产阶层的挤压有三种状态:

一是利用公共权力截获过多的利益和发展机会,这是强势阶层挤压中产阶层最常见的一种状态。这里用“截获”,是因为本来这些利益和机会应该通过公平竞争获取,但是,强势阶层凭借权力,没有使相关利益和发展机会进入公平竞争过程,而在之前就“收入囊中”了。“这是一种利用行政赋权获取社会资源而过多地占有发展机会、过多享有利益结果的社会排斥现象。”^⑩尽管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他们在“学历、文化素养、思想观念、专业技术知识、就业能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有些人还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而另有一些经理人员更可能以自己的组织管理经验和生产控制权力傲视于人”^⑪,但是,他们还是抗不过公权的力量。一些掌握着公权的人,利用手中权力千方百计把发展的机遇留给自己、亲信、子女、有利害关系的人等,甚至利用制度供给者和执行者的身份,通过“职权法定”、“行为法定”与“程序法定”使自身及其部门利益、发展机遇法定化。^⑫从而,严重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最受伤害的就是中产阶层,他们满以为只要有能力、拼命干就能实现向上流动,事实上,那些高门槛、高薪酬、有着广阔发展前途的职业,被拥有权力的人及与其有连带关系的人轻而易举地拿走了,而自己能力再强、工作再努力,也只能年复一年地在原有职位甚至在边缘职位上徘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产阶层向上流动趋缓,向下

流动增速;在单位、部门中,徘徊于较低职位或边缘,上升空间和发展机会受阻。这就极大地影响了边缘中产向半核心中产和核心中产的质变。^⑬

二是通过操纵市场规则为自己、亲信、子女、配偶以及其他相关者牟取特殊利益甚至暴利,这是强势阶层挤压中产阶层的又一种状态。中产阶层人士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在竞争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总是希望凭借自己的知识、技术、本领、能力、干劲,能够达到高效率,从而得到丰厚的回报。然而,中国的市场还是一个不太完善的市场。强势阶层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凭借自身的权力优势、资源优势、网络优势,上下其手,操控市场规则。他们既可以凭借各方面的优势,与公共权力联盟,影响公共权力部门政策和规则的制定,使制定的政策和规则有利于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甚至可以利用优势地位,操控规则的运作,对市场规则作有利于维护和扩大他们既得利益的解释。这就使中产阶层一直寄予希望的市场的形式公平遭到破坏,从而使中产阶层人士凭借自身能力公平竞争得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变得异常小。

三是利用权力、财富和地位优势,过多地占有优质文化资源,是强势阶层挤压中产阶层的第三种形态。中产阶层得以上升流动,主要通过自致性人力资本的获得和不断加厚,这需要不断地接受好的教育和培训,需要各种高雅文化环境的熏陶。事实上,强势阶层非常清楚地知道,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要保住自己的强势地位,并使这种地位顺利地获得代际间的传承,无论是自己还是子女,都必须接受优质的教育 and 文化熏染,提升文化内涵。否则,今天的上层阶层的地位,明天可能为富有人力资本的上升中的中产阶层所取代。然而,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源总是有限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稀缺的。因此,强势阶层或利用手中的权力,或利用财富优势,或利用在社会结构网络中所处的权威位置,获得某种潜规则的照顾,自己及子女捷足先登占取优质教育文化资源。比如,进入国内一流大学、前沿专业,甚至进入像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学习深造。而中产阶层及其子女,要获

得好的教育文化资源，除了自身的拼搏别无他途，因而能够进入一流的学校只是一个概率性机会。这样，在教育这个竞争的起点上，强势阶层明显占了优势，这是强势阶层对下层尤其对中产阶层最深刻的挤压。除此之外，各种各样高雅文化场合，如国际一流的现场文艺演出，世界一流的现场体育竞技，各式各样的高层论坛，基本被强势阶层“垄断”娱乐权和参与权，这些活动场所，是强势阶层与中产阶层以及更广大的中下阶层文化区隔的幕墙，中产及其之下的阶层很少有可能进入这样的场合而获得高雅文化的浸润。正如布迪厄所言，行动者对商品的占有方式，在貌似自然形式的区隔中创造了排他性的阶级区隔。“占用一个艺术品，也就是确证自己是对于某个客体的排他性占有者，以及对此客体的真实趣味的排他性占有者。这就会转变成对于那些不配占有该客体的人们的具体化的否定，这些人缺乏物质的或符号的手段去占有它，或完全缺乏某种可以‘倾其所有以献身于它的’强烈欲望去占有它。”^{②①}

4. 成长周期的困厄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开始追求现代化，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才开始发育；但是，由于1949年建国后的“去阶层化”做法，处于“襁褓”中的中国现代中产阶层并未得到继续成长。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中产阶层重新发育成长。从这个过程看，中国当代中产阶层还处在成长阶段的幼年时期。这是中产阶层成长的脆弱期，将会纠结在一系列“成长的烦恼”之中。

“成长的烦恼”之一：“社会化不足”与“过度社会化”。^{②②}犹如个体处在儿童期，早期社会化是人格形成的关键。同样，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当代中产阶层，也必须经历中产阶层人格形成的早期“阶层社会化”阶段。但是，当代中国中产阶层明显存在着“社会化背反”，这种“背反”表现为“社会化不足”与“过度社会化”同时存在。

首先是“社会化不足”。由于建国后近30年的“去阶层化”，当代中国中产阶层是一个“断层阶层”。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新生的中产阶层，多数是从贫穷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家庭中脱颖

而出的。从阶层的社会化这个角度看，新生的中国当代中产阶层，既没有成熟的现代中产阶层文化环境对他们熏陶渐染，也没有“中产阶层父母”对他们进行社会教化。尽管他们已经具有现代中产阶层的某些基础条件，但是，与符合综合标准的现代中产阶层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甚至一部分70年代出生的中等收入者，虽然从收入、职业、教育上看，他们已经达到中产阶层的标准，但事实上，他们还缺少现代中产阶层的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他们对急剧的社会变化反应较为迟钝，恪守贫困年代的节俭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过度社会化”在某些中产阶层的成员中也较为突出。由于缺乏自己的“中产阶层父母”来施以教化，“外来和尚念的经”起了很大作用。改革开放使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文化大量进入中国，对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出生的新中产阶层成员起到了“过度社会化”作用。这里的“过度社会化”是指西方中产阶层文化的某些方面对中国部分中产阶层成员产生了过度的影响，尤其是西方中产阶层消费文化对他们影响明显。他们在没有发达国家中产阶层那份丰厚的收入时，就提前进入了“符号消费”过程，认为某些“符号”是中产阶层身份的主要标志。他们崇尚品牌，追寻时尚，喜好炫耀，甚至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去“啃老”而达到“符号消费”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忽略的是中产阶层内在人格素养的培育。

“成长的烦恼”之二：身份自我认同的偏差。中产阶层身份的自我认同，是个体界定中产阶层的一种心智模式，也是个体在心目中树立的中产阶层的标杆。这个标杆是由多维标准组成的。它不仅职业标准、收入标准、学历标准等外在标准，还包括现代公民素养的内在标准，如现代公民意识、价值观念、使命感以及各方面的能力等。按理说，中产阶层的外在标准和内在标准达到统一，才具有真正的中产阶层身份。而事实上，二者却常常是分离的。这就是理论界认为的，在身份认同方面，始终存在着平面自我与深度自我的张力。平面自我只是认同身份的表象，而深度自我是在

心智和实践层面上质疑、否认、消解和根除“共同体和传统的中介力量”，力图将个体从这些中介力量中抽离出来，自由地选择他所认同的身份所体现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生活范式，也即从内在超越其他的身份。^②

反映在中国当代中产阶级个体身上，这种分离尤其明显，他们常常只按外在标准进行中产阶级身份的自我认同，注重的是中产阶级平面化自我；而从内在的现代公民标准进行中产阶级身份自我认同来看，他们达到中产阶级的深度自我还有一定的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另一方面与学界对中产阶级的界定偏颇和研究不足以及媒体一定程度的误导不无关系。理论界对中产阶级的界定，大多集中在表象上，比如，是不是中产，主要看有没有白领职业，有没有中等及以上收入，是否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等，甚至有少数学者把拥有一套及以上中高档住房、一辆及以上中高档私人轿车以及过着体面的生活，作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标准。同时，这样一种对中产阶级的外在化界定，经过媒体的渲染，具有了放大效应。而对中产阶级应具有的现代公民素质，如坚持务实创新、追求公平正义、恪守诚信友爱、敢于承担责任等，无论是理论研究、舆论引领还是实践培育都很不够。这种对中产阶级界定的知识反应和媒体渲染形成了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拟态环境”，使个体对中产阶级身份的自我认同产生偏差，以至于有些青年中产阶级个体为了有房、有车、有体面的生活拼尽全力，最终沦为“房奴”、“车奴”、“孩奴”，而荒漠了中产阶级应有现代素质。

“成长的烦恼”之三“资本欠缺”与“回报欠缺”。资本欠缺(capital deficit)和回报欠缺(return deficit)是边缘中产阶级难以上升流动为半核心中产和核心中产的又一重要的主体性原因。“资本欠缺是指不同的投资或机会所导致的某一群体的资本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对不足(与另一群体相比)的结果。”“回报欠缺是指一定质量或数量的资本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会产生不同的回报和结果。”^③

中国中产阶级的资本欠缺是一种很特殊的现

象。首先，多数中国中产阶级来自草根阶层，比起富裕家庭的成员，他们的物质资本欠缺；比起高级官员家庭的成员，他们的政治资本欠缺；比起精英家庭的成员，他们的社会资本欠缺。同时，强势阶层利用公权截获发展机遇，依仗强势操控规则，利用地位优势占有优质文化资源，挤压了中产阶级的资本获取。当来自富裕家庭、高级官员家庭和精英家庭的成员，凭借厚实的资本，顺利地上升流动到核心中产阶级甚至上层社会，众多的中产阶级常常因缺少某些方面的资本而在中产阶级的边缘长期徘徊。

中国中产阶级的回报欠缺也是显而易见的。中产阶级的回报欠缺，一方面是因为强势阶层的巧取豪夺，他们投入与他人等量甚至更少的资本却能够获得比他人更多的回报，中产阶级就在这样的不平等竞争中失去一定的应得回报；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边缘，他们的眼光、胸襟、思维和行为方式都会受到限制，与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社会精英相比，他们投入等量资本，收获却可能远不如社会精英。

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严重阻碍了边缘中产向半核心中产和核心中产的转变。

毫无疑问，当中国正在努力践行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时候，追求中产阶级由量增向质变发展已是势在必行。努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积极营造现代思想文化氛围、培育现代公民意识，是中产阶级健康成长的关键。

① 陆学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 60 年》，《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 年第 7 期。

②③⑦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49～254、254～256、252～253 页。

④ 周晓虹《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5 页。

⑤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02 页。

⑥⑧⑩ 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与社会态度》，《社会》2008 年第 2 期。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196 页。

⑩ Giddens,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Hutchin-

son & Co. Ltd. 1973, pp. 111 ~ 112.

⑫王孟龙《中国不存在“中产阶级”》，《金融时报》(英国) 2006年7月8日。

⑬蔡振峰《中国还没有形成中产阶级》，《环球时报》2004年1月28日。

⑭“可行能力”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主要指个人能够实现某种行动或状态的能力指向，也就是个人潜在的能够选择某种行为并实现其目标的能动状况。可行能力与森强调的自由、人的差异性与机会等概念密切相关。参见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⑮准政府部门，即指那些参照公务员待遇的党委部门、群众团体和部分事业单位。

⑯⑰⑱张宛丽《中国“新中产阶级”面临“精英排斥”》，《人民论坛》2007年第9期。

⑲严翅君《公正：和谐社会制度建设的着力点》，《理论前沿》2007年第18期。

⑳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p. 280.

㉑“社会化不足”和“过度社会化”是格兰诺维特提出的两个概念。霍布斯曾提出一个难题，即人因为天性中的好竞争(求

利)、好猜疑(求安全)和好荣誉(求名)而形成争斗，人对人的关系变成了狼对狼的关系。人们通常把这称为“霍布斯困境”。格兰诺维特认为霍布斯关于人的这样一种观念是一种“社会化不足”的观念。但霍布斯提出了走出困境的方案，即人们出于理性，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个人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这个人或组织能把大家的意识化为一个人的意识，能把大家的人格化为一个人格，大家服从他的判断、服从他的人格。格兰诺维特把这种秩序下的人称为“过度社会化”。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pp. 483 ~ 487。本研究借用这两个概念来分析中国当代中产阶层早期成长的复杂状态。

㉒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35~238页。

㉓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8~99页。

作者简介：严翅君，历史学博士，1950年生，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丁惠平)